



20世纪人文地理纪实 第一辑
主编：杨镰

居延海

董正均/著 杨镰 张颐青/整理

Juyanhai

中国青年出版社

013029258

K922.6
03

20

主 编：何幼雄

居延海

董正均 / 著 杨镰 张颐青 / 整理



Juyanhai



北航

C1637625

中国青年出版社

K922.6
03

(京) 新登字083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居延海/董正钧著;杨镰,张颐青整理.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12

(20世纪人文地理纪实)

ISBN 978-7-5153-1179-1

I. ①居… II. ①董…②杨…③张… III. ①额济纳旗—概况 IV. ①K922.6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254376号

*

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 发行

社址:北京东四12条21号 邮政编码:100708

网址: www.cyp.com.cn

编辑部电话:(010)57350511 门市部电话:(010)57350370

三河市世纪兴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675×975 1/16 10印张 2插页 115千字

2012年12月北京第1版 2012年12月河北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定价:20.00 元

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010)57350337

《20世纪人文地理纪实》

总 序

20世纪，是人类社会进展最快的世纪。20世纪的通行话语是“变革”。

就中国而言，自进入20世纪，1911年“辛亥革命”为延续数千年的中国封建王朝的谱系画上了句号，1919年“五四”运动，新文化普及，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为现代中国奠定了基础。20世纪前50年间，袁世凯“称帝”、溥仪重返紫禁城，北伐、长征、抗日战争……直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新中国受到举世关注。此后，特别是从“文化大革命”到改革开放，这些历史事件亲历者的感受，深刻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

20世纪是中国进入现代时期的关键的、不容忽视的转型期，以20世纪前半期为例，1900年，“八国联军”践踏中华文明，举国在抗议中反思；1901年，原来拒绝改良的清廷宣布执行新政；1906年，预备立宪……以世界背景而言，“十月革命”，两次“世界大战”，成立联合国……1911年到1949年，仅仅历时30多年，中国结束了封建社会，经历了半封建半殖民地到社会主义的巨大跨越。反思20世纪，政治取向曾被视为文明演进的门槛，“不是革命就是反革命”，不是红，就是黑，一度成为舆论导向，影响了大众思维。

无可否认，在现代社会，伴随社会的进步、发展，中华民族的民主、科学精神逐步深入人心的过程，是中国历史最具影响力的事件，

是可持续发展的推动力、中国现代时期的鲜明特点。

《20世纪人文地理纪实》则为这一影响深远的历史过程，提供了真实生动的佐证。

20世纪的丰富出版物中，一定程度上因为政治意图与具体事件脱节，人文地理著作长期以来未能受到充分关注，然而文学、历史、政治、文化、语言、民族、宗教、地理学、边疆学、地缘政治……等学科，普遍受到了人文地理读物的影响，它们是解读20世纪民主、科学思维成为社会主流意识的通用“教材”。

人文地理纪实无异于在社会急剧变革过程进行的“国情调研”，进入20世纪的里程碑。没有这部分内容，20世纪前期——现代时期，会因缺失了细节，受到误解，直接导致对今天所取得的成就认识不足。

就学科进展而言，现代文学研究是最早进入社会科学研究前沿位置的学科之一，《20世纪人文地理纪实》则为现代文学家铺设了通向文学殿堂的台阶：论证了他们的代表性，以及他们引领时代风气的意义。

与中华文明史、中国文学史的漫长历程相比，从“辛亥革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30多年短如一瞬间，终结封建王朝世系，弘扬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现代时期定位的标志。

“人文地理”，是以人的活动为关注对象。风光物态、环境变迁、文物古迹、地缘政治……作为文明进步的背景，构建了“人文地理”的学术负载与阅读空间。

关于这个新课题，第一步是搜集并选择作品，经过校订整理重新出版。民国年间，中国的出版业从传统的木刻、手抄，进入石印、铅

印出版流程，出版物远比目前认为的（已知的）宽泛，《20世纪人文地理纪实》的编辑出版，为现代时期的社会发展提供了参照，树立了传之久远的丰碑。否则，经过时间的淘汰，难免流散失传，甚至面目全非。

《20世纪人文地理纪实》与旅游文学、乡土志书、散文笔记、家谱实录等读物的区别在于：

人文地理纪实穿越了历史发展脉络，记录出人的思维活动，人的得失成败。比如边疆，从东北到西北，没有在人文学地理纪实之中读不到的盲区。21世纪，开发西部是中国现代化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开发西部并非始于今天，进入了现代时期便成为学术精英肩负的使命：从文化相对发达的中原前往相对落后的中西部，使中西部与政治文化中心共同享有中华民族的丰厚遗产，共同面对美好前景。通过《20世纪人文地理纪实》，我们与开拓者一路同行，走进中西部，分享他们的喜怒哀乐、分担他们的艰难困苦。感受文明、传承文明。源远流长的华夏文明与中华民族的文化，不会因岁月流逝、天灾人祸，而零落泯灭。

《20世纪人文地理纪实》是20世纪结束后，重返这一历史时期的高速路、立交桥。

《居延海》与董正钧

杨 镰 张颐青

居延，是内蒙古自治区最西部的额济纳旗的古地名。从秦汉时期起，居延成为丝绸之路关键地段独当一面的要塞。汉代典故苏武牧羊，具体地点已难指认，然而居延因之成为西北边塞的地理标志。中国学者董正钧所著《居延海》（额济纳旗）则是居延区域人文地理研究的承前启后之作。

“居延”，据说出自匈奴语，含义是“幽隐之地”。汉武帝太初三年（前102）设置了“居延都尉”。古代边塞诗有不少名篇杰作涉及居延。唐代，居延成为边塞战和的重要区域的代名词，陈子昂《居延古城赠乔十二知之》、王维《出塞行》的名句“居延城外猎天骄，白草连天野火烧”，传诵千古。王维《使至塞上》，被视为边塞诗的代表作：“单车欲问边，属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居延的重要，在于位置不可替代。居延依托于居延海存在，作为西北边塞大泽，居延海是河西走廊的大河黑水的终端湖。“黑水”，古称“弱水”（水弱不能胜舟）。黑水，西夏时期叫做“亦集乃”，是党项语音译。而“额济纳”则是“亦集乃”在蒙古语中的转译。发源于祁连山的黑水—额济纳河，养育了居延海—额济纳旗绿洲，在中华文明史上出现了牵系东西，贯通南北的结系点。

居延海从边塞重镇，转换为西北绿洲、西蒙古旧土尔扈特部落世

袭游牧地，是清前期的大事。

提起西蒙古土尔扈特部落，世人都知道乾隆年间从俄国回归大清的壮举，在西蒙古土尔扈特部落举族返回东方之前三四代人，在伏尔加河流域的土尔扈特部落汗王阿玉奇的侄子阿喇布珠尔赴西藏朝拜达赖，归路却为准噶尔部阻挡，阿喇布珠尔率众内服，康熙封为“固山贝子”，部落则游牧于河西敦煌等地。雍正九年（1732），将空旷的额济纳河流域赐给阿喇布珠尔之子丹忠，作为游牧之地。乾隆十八年（1753），在渥巴锡率部回归之前十几年，清廷正式设立了额济纳土尔扈特特别旗，直隶理藩院。额济纳河终端湖——居延海与沿岸荒漠草原成为旧土尔扈特领地。

进入20世纪，居延海一再发现古代遗址，引起举世关注。

1906年，俄国探险家科兹洛夫在居延边塞发现了规模宏大的古城——黑城（“喀喇浩特”），黑城出土文物与其他遗址不同，所出主要是西夏、元等王朝的珍贵民族语文文献，一经报道立即引起世界考古界、文物界的轰动。此后，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的瑞典考古学家贝格曼在居延古边塞发现了多达一万枚的汉代简牍。“居延汉简”与敦煌藏经洞，曾被并称为中国20世纪两大考古成就，形成了“居延汉简学”。从1927年9月20日开始，居延—额济纳接待了中瑞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西北科学考查团在额济纳河的原生胡杨林地设立了大本营。多得不胜枚举的探索发现，使居延海成为中外媒体竞相报道的领域。

此前中断若干世纪的文明路径，使古老的边塞与新的游牧地，接续起中国西北历史与现实的间隔。

在居延海—额济纳旗，除黑城文书、居延汉简，仅贝格曼就发现

了成吨的文物，其中除居延汉简，还有书写简牍用过的毛笔实物，被称为“华夏第一笔”。

当时，额济纳旗—居延边塞是进出西部的大门，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不但在当地设立了大本营、汽车维修车间、国际邮件接收站，还建立了中国西北第一个气象站。气象站是为开通欧亚航空线而设置。

20世纪前期，涉及额济纳旗—居延边塞的人文地理纪实，有斯文·赫定《丝绸之路》、徐炳昶《徐旭生西游日记》、贝格曼《考古探险笔记》等等。这些著作影响广被，知名度颇高。是与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探险考察伴随的成果。

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离去后，《大公报》记者范长江来到居延海。作为受读者器重的记者，范长江以《忆西蒙》等书，使额济纳旗—居延边塞备受关注。

三四十年代之交，额济纳土尔扈特旗梅林（王府官员）苏剑啸等民主人士，坚决抵制了日本帝国主义敌特的活动。

“辛亥革命”之后，开发西部、富民强国受到空前重视。在多民族聚居的西部普及现代文明，是“辛亥革命”的直接成果。由谢彬《新疆游记》、林竞《亲历西北》（即《西北丛编》）、黄奋生《百灵庙巡礼》、马鹤天《内外蒙古考察日记》……如同“接力”，开拓了国人面向西北的新视野。开发西部，成为社会精英共识。

1944年，27岁的董正钧参加了民国政府农业经济部门的“川康宁农业调查团”，在工作期间受委派来到居延海（额济纳旗），接续起对居延海的考察，为当地生活现状做出现场评估。1944年初，董正钧所在的农业调查团原拟由宁夏穿越阿拉善旗，西赴居延海，因经费及设备有限，改道经兰州、酒泉，沿弱水北下居延，克服了生活上工作

上的艰苦条件，往返留居，历时八个月之久。董正钧先生深入居延海的实际，作为居延的一个居住者，通过《居延海》（额济纳旗），真实地反映了所见所闻所感。

《居延海》（额济纳旗）于1945年完成初稿，几经修订，1952年3月由中华书局出版。通过这本人文地理纪实，抗战胜利前后的居延海—额济纳旗以至西北边疆的文明走向，展示在读者面前。

《居延海》（额济纳旗）一书是这次农业调查的成果，而额济纳自古就是游牧与农耕并重的区域，从清代以来，安置游牧的土尔扈特部落、因为农耕移民在黑水流域增设毛目县，使居延海区域的面貌有极大改变。调查地点的确定，使董正钧从中华文明史的宏观视野，进入了“川康宁农业调查团”成员的具体位置。

通过《居延海》（额济纳旗）一书，作者披露出对毁坏原生态森林植被的担忧。额济纳尽管处在荒漠纵深之处，保护环境，仍然是千年历史的重托。

作者到来前后，居延海生态面临失衡。在斯文·赫定的著作中，居延海—额济纳旗的原始胡杨林地，是塔里木的再现。在当地，胡杨称作“陶来”，与红柳（怪柳，蒙古语“苏海”）、梭梭（蒙古语“札干”）、沙枣（蒙古语“吉格德”），共同为荒漠撑起一具巨大的绿伞。但是在额济纳，胡杨林遍地都是，毁林也相当常见。董正钧指出：胡杨含碱分颇多，近年汉人来额济纳旗，常常烧胡杨树取碱，驻军消耗碱的数量特大，一时烧碱之风颇盛。直径尺半，高达丈余的胡杨，原树烧尽，大约可得一斤碱。在建国营附近被烧毁的胡杨甚多，枯树林立，如同自然界提供的“诉状”。

考察过程，董正钧面告当局：

沙漠之中，植树匪宜，一树长成费二三十年，长成绿林，点缀沙漠，并固定流沙，厥功殊伟，正宜设法保护，扩充栽植，以渐改沙漠为森林，变不毛为绿洲，乃建国生产之万年基业。不宜为一斤之碱而损此大树也。如听之烧损，将来居民增多，此风一盛，为贪蝇头之利，而不顾永久之策，取柴烧碱，任意摧残，不加禁止，恐数十年后仅有之森林，将无遗类，浩浩沙漠将不复有高大之乔木，欲再育培而复之，戛戛乎难矣。

这是以维护绿色林地为基础的《环保告白》，发表在近70年前。保护生态（特别是在额济纳旗这样远离都市的为荒漠环绕的绿洲），以维护环境为己任，知识分子忧国忧民之心跃然纸上。与人为毁坏植被针锋相对的，是防沙造林。

董正钧强调：近来只要谈到建设西北，无不首重造林。西北沙漠逐渐南移，沙漠内缘良田民居被流沙掩埋，屡见不鲜，照近百年内侵速度，数千年后秦岭以北将尽成沙漠。

在书中，照实际情况记述了额济纳河流域造防沙林过程：

金塔、鼎新（毛目）农民所造之防沙林，最优者共分三重：外侧为枝条丛生之灌木，多属毛柳、红柳等，中间为树冠密茂之乔木，如杨柳、榆等，内侧密排主干高直之白杨，高达三四丈，三重宽度合计约一丈。三层树冠相接，由地面直达白杨树梢，如一带绿墙，飞沙非阻降林中，即越树远去，难落田中，功效颇大。

研究造林吞沙、绿化戈壁沙漠之法，实为建设西北之基本

工作。如能成功，则西北之沙漠戈壁将尽变成沃壤，为富饶之经济资源，并可改善气候，点缀风景，中亚、北非之人将同受其惠，岂仅造福我国人民而已哉。

与之相应，《居延海》还具体写出：温室种菜、农田轮种、土壤退化后及时栽培牧草等等保护环境的建议。读到这里，很难相信作者是初来乍到的外乡人。

同时，在《居延海》相应章节，对红柳作了人性化的描写，作为额济纳旗的象征：“红柳在额济纳旗者，皆为天然生长；不加人工，但系灌木，高达丈余，矮者亦在六尺左右，密生处，人不可入，一望无际，方圆数十百里，堪称奇观。尤以夏秋之交，红花招展与沙漠之中，骆驼出没于柳枝之下，牧者歌唱于密林深处，塞外秋色，雄伟壮阔，兼具秀丽，观之不由心旷而神怡也。”

红柳是土尔扈特人的象征。红柳生长在自然环境中高达数丈而极干旱的沙丘。蒙古族牧民不畏严寒艰苦，生活单调，心地善良质朴，豪爽宽厚待人。百年来，居住地未受战争影响，所以仍保持其沉静、真诚的原始游牧生活方式。

蒙古族牧民，是居延海—额济纳旗的主要居民，也是作者朝夕相处的邻居。从个人经历来说，年仅27岁的作者是第一次来西北，对蒙古族生活习性、民俗生态的描述，出自内心真实感受。

……地广人稀的额济纳旗，谋生活不难，而民无冻馁之虞，本旗全境无一乞丐，人民极痛恨鄙视偷盗行为，所以绝无盗窃事件。“可谓夜不闭户，道不拾遗。不知者每觉荒野千

里，必多匪徒，而不敢前往，既入其境，如进世外桃源，秩序井然，反觉向之过虑为多事焉。

通过直接接触，作者对当地待客之道感触极深：“蒙人和平敦厚，重礼而忠诚，已尽失元时横征欧亚之遗风，其和善之情形，几非外人可想及。”“……客人入蒙古包，不问是否相识或有无关系，主人均招待饮食，过路旅客借地休息者亦同客人，入包叙礼毕，主人即另煮新鲜奶茶……取出奶油、糌粑、奶查、奶皮子、油炸面饼等放于桌上，请客自行取食……吃过之后，即擦嘴而出……主人既不取费，而客人亦不言谢。蒙人常谓：‘谁能负锅行路？代客饮食，自属应尽义务，何得需索。’故无‘谢谢’之虚伪名词。”

涉及额济纳旗居民整体的生存环境与生活质量时，作者董正钧写出对蒙古族牧民缺医少药、人口减少的忧虑。

蒙人不知医药卫生，有病唯知念经祈祷……输入大量药品器材，设立医院，并派往医生诊治疾病等。推行之先，除多方宣传外，必供以廉价之用器药品或赠送之，更教以用法以示范。

蒙古族居民缺乏性知识，花柳病等性病蔓延甚盛，人口日减，“此实为最大之危机，如不急谋救济，其人口必自行消灭。救济之道，厥唯宣传婚姻法，建立一夫一妻制度，施行性教育，使度正常之性生活，并宣传性病与民族之关系，俾蒙人深知其利害，复运入大量性病药剂，普遍严格注射与检查，举行大规模之扑灭性病运动，如此多方并进，性病自减，此为改进蒙人生活增加人口最重要之工作。”

有关情况，作者据实写出，作为改进的依据。

在20世纪40年代的边远牧区，《居延海》以实录调研情况的方式，写出了“人口日减”的原因与改善生活条件的设想。时至今日，边远牧区仍然存在相近的难题，提高居民生活质量，离不开改善医疗条件与普及教育设施。

与改善医疗条件一样，在额济纳旗增强教育设施，是一大难题。

当地办学极其困难，因交通不便，生活艰苦，有学校也极难聘请到教职员。另外，当时蒙古族不注重读书识字，唯一崇拜喇嘛，在校学生是由旗政府按户抽派而来，被称作“学差”，等于一种负担^①。

“蒙人曾谓：学差之期不宜过长，恐儿童难受其苦，求以一月为期，轮流更换新生，以免少数人出长期学差之亏……”

而在额济纳旗，在校学生全部公费。当时，民国政府教育部明确规定，内蒙古的学校有国家提供的相应资助：

每月每人津贴膳费二百元，文具费十元，新生入学时，每人发制服一身，其他如书籍纸张等用品，皆由学校供给。另设有学生数百分之三十“清寒奖学金”，每名月奖百元。

后经与蒙古族头人协商，“允供全膳开学”，并有蒙古包充学生宿舍。开学后，最困难的是学生经常请长假（长者在三月以上），事由“多为赴庙磕头，家中念经等”，如果不准，“（家人）则坐卧校外，风餐露宿，数日不去。”

.....

^① “学差”，等于以子女上学，完成差遣徭役。

居延海—额济纳旗，偏居西北，环千里戈壁，沙漠阻隔，交通艰险。1927年9月，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受到土尔扈特王爷接待，曾在当地做进入新疆的准备，至1927年11月，考查团陆续起程前往新疆哈密。1944—1945年，董正钧来居延，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的成果还没有披露。在8个月之间，董正钧完成了任务，写出《居延海》（额济纳旗）一书。书中对额济纳旗的地理位置、自然环境、交通、人口、政治、宗教、经济及社会生活，做了实地考察与记述，体现出一位社会科学家严谨、专业，一丝不苟的态度。书中通过实例表达了对蒙古民族居民的赞赏、同情和担忧，希望通过加强文化教育、普及民主精神，提高生活质量。书中最后一章“建设额济纳旗建议”，作者以严谨、超前的视野和博大胸怀，对居延海—额济纳旗自然环境的保护、生活走向的认定，提供了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设想。

“建设额济纳旗建议”第三节“研究造林吞沙绿化戈壁沙漠”之中，作者结合20世纪前期在新疆“沙漠之中”发现“废城”这一“常见不鲜”的情况，就额济纳与阿拉善一带“不正当之农垦，变天然优良牧场森林为耕地，终至田瘠人散”的现实，指出这类反常“开发”，开荒再撂荒，“似亦为沙漠南移之一因”的见解，等于为民国政府农业经济部门的“川康宁农业调查团”之行，写出读者能获益匪浅的“总结”。而这一切，是来到居延海，生活在蒙古族、汉族民众之中，胸中激荡着数千年历史的回声，直接面对居延古边塞与土尔扈特牧民受到的教育与启发。

《居延海》（额济纳旗）正文之后，董正钧附录了一组诗篇。其中包括他的一首《中秋夜行戈壁滩》。在诗序他表述了此行的艰难与作为年轻学子，为边疆考察作出贡献的决心：

一九四五年，余赴西北考察，途次居延海上。适届中秋，塞外风霜，千里草合，皓月之下，跨驼长征，或穿森林草原，或越戈壁沙漠，黑水森森，鹅雁翩翩。触景生情，倍增游子家国之感，瞭望塞北，平广无垠，极尽雄伟壮阔之势，有吞沙漠、平山丘，催骆北上之志，一时感慨万端，乃仰天高歌，成《中秋夜行戈壁滩》一首，聊泄胸中之积郁尔。

这首七言古诗，以“愿留姓字黑水头，验取他年雪泥之鸿爪”作结，《居延海》（额济纳旗）是董正钧留在开发西部历史过程的印记。

作为生长在江南水乡的青年学子，来到荒漠之中的古绿洲居延海，数千年历史的负重，使他自觉承担起感受文明、传承文明的责任。

董正钧（1917—1980），安徽萧县杨楼镇董楼村人。民国三十年（1941）毕业于西北农学院，一生主要在西北各省从事农业经济学和经济植物的考察研究工作。《居延海》（额济纳旗）一书，填补了当地自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离去之后的学术空白。额济纳旗的新方志《额济纳旗志》一再引证了《居延海》的内容，而且说：除1937年范长江《忆西蒙》，1944年董正钧实地考察，并且写出《居延海》，“记述了额济纳旗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和教育等各项事业的一些史实”，关于当地“别无方志专著”^①。

从考察居延海走进学术领域，董正钧还是中国罗布麻研究的奠基者、创始人。1952年，将新疆罗布泊地区的一种野生经济植物，定名“罗布麻”。1957年，到中国科学院的科研单位任副研究员，专门从事罗布麻研究，主持编辑出版了《罗布麻的综合利用》等专著，发表

^①《额济纳旗志》，方志出版社1998年8月出版，第837页。

论文数十篇。

“文化大革命”，董正钧以“莫须有”罪名遣送回家，过着半监管的生活。但他不改初衷，继续自费进行罗布麻解烟毒的动物试验，并取得了重要成果。

粉碎“四人帮”，董正钧到安徽大学任教，并担任了安徽省植物学会副会长。直至临终前，他还在撰写《向南京植物综合利用研究所提供罗布麻的研究建议》。1980年1月，因患脑溢血，在合肥逝世。

居延海—额济纳旗位于21世纪西行通道的“十字路口”，中国西北是为中国走向世界前列提供基础能源——煤、铁等矿产的基地，同时也是第二条连接政治中心北京与大西北的高速公路与磁悬浮铁路必经之地。作为衔接历史、认识现实、展望未来的参照，董正钧《居延海》（额济纳旗）是不能略去不读的区域人文地理纪实。

本次整理《居延海》所用底本，是1952年3月中华书局初版的版本。